

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新知识群体

杨国强

(上海社科院 历史所 上海 200020)

摘要: 本文叙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新知识群体的过程。新知识群体是由新政催生的,是通过大量报刊政论文章哺育出来的,他们诞生于思想(政论)淹没知识(科学)的时代;新知识群体不再出于科举,而是出于新式学堂,而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大多是中等社会群体,而不是社会下层民众,这使得晚清最后十年的新知识群体趋向于演变中的世界和正在重造的中国,而此两者都以城市为中心,换言之,新知识群体梳理了农村社会与下层社会;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群体转化过程中,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杰意态越来越近,新知识群体具有志士化的轻死剽急的趋向。

关键词: 新知识群体 政论思想 新式学堂 志士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1902 年,梁启超作《敬告留学生诸君》,“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描述了一个新知识群体在人心中的升起:“今之中国岌岌矣。朝廷有欲维新者,则相与咨嗟焦虑曰噫!无人才;民间有欲救国者,则相与咨嗟焦虑曰噫!无人才。”一片苍茫之中,“举国有志之士”所“矫首企踵”而“且祝且祷”的都是“今日之学生”。因此,他慨言乎言之曰:

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一》)

次年,《苏报》刊布《倡学生军说》,推崇学界,言之尤见热切:“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名之曰‘主人翁’,比之曰‘狮子吼’,其于学生如其殷勤也。彼学生者,又以西乡隆盛、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自命,欲行其惟一之主义,以造一新中国,使吾汉族永享无穷之幸福。”^[1]这些文字所指述的,都是正在“游学”的读书人和已入学堂的读书人。他们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里一群一群地被“兴学育才”的时潮孵化出来,而后又“各负所学以自岸异”,一群一群地汇入改造中国的时潮之中,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呼风唤雨,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推波助澜。在举子士人的千年历史之后,这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蜕变期。从庚子到辛亥,蜕变中的知识人曾经为天下造跌宕起伏之势,而笔下的汪洋恣肆转化为世间的激荡驰骤之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成了身不由己者,纷纷为跌宕起伏之势裹卷而去。

—

作为一个群类,20 世纪最初的知识人是由新政催生的。因此,游学与学堂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自然的过程之中。作成于 1901 年的《江楚会奏三折》曾以疆吏的臂力倡兴学,而其间的思虑所注,则在“速成”:

事急需才,恐难久待。查日本文武各学校皆有速成教法,于各项功课择要加工,于稍缓者量加省减,刻期毕业。应旨飭出使大臣李盛铎切托日本问部省、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代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说以应急需。^[2]

以此开先,意在寻取一种捷径。然而用国家力量为捷径作导行,则“速成”很容易广罩多数而变为兴学的常态。六年之后,学部的奏议统计说:

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展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3]

显然,日多一日的留学生大半喜欢走捷径。但与捷径相对称的往往不是学问,而是世人眼里的“来去飘忽,作辍靡常,毕业者仅计年期,后来者又循故辙”^[4]。其间的重心并不在科目与知识。由于速成的急迫,游学日多一日,学堂也日多一日。郭沫若后来说,辛亥年之前,方圆只有二十二里的成都城里单单法政学校便已办了好几所,而且还在越办越多。叙述之中夹带的正是讥嘲。彼时他正在成都“久负盛名”的中学堂里做学生,“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已经使人不能厌足,而“新学”更次,“讲理化、数学的教员”连“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郭沫若选集》一,卷上,第155、15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话里有文豪追说往事的睨视之态,但比照当日庙堂议论中所说的“盖以未受教育之人,强之行教育之事,支离蔓延,谬种流传,其弊殆不能悉数”,^{[4] (P964)}则他在成都所见到的景观别处也能见到。十年兴学造出了成千成万的学堂而造不出一种为学之序。因此,学生常常要脱出学堂的课程范围,各是其是,神游八方。其间的重心也不在科目与知识。

与知识相比,十年兴学中更富有笼罩力的是思想。游学中的知识人与学堂中的知识人虽然以受学为业,其实是被思想哺育出来的。

曾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里露过身手的伍特公,五十八年后回忆旧事,印象最深的情节之一是“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人看”《新民丛报》。^[5]《新民丛报》的本色即在思想。以退学风潮喧腾而起的1902年为例,次第见于其篇目之中的《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欧美各国立宪史论》等等都是以文字述思想之作。全年二十四期(号)《新民丛报》里,与之相类的论说共有一百八十多篇。^{[3] (P146)}欧西的人物,欧西的历史,欧西的理想,欧西的论争先后被牵到了中国,对于众多读报的知识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无疑是一种扑来的思想浸灌。钱基博后来说“《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8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在“播被尤广”的过程里,学堂提供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阅读群体,而《新民丛报》则以思想的浸灌培育了这个阅读群体。而后,《苏报》、《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挟着更见激扬的思想波涛而来,使那一代知识人由浸灌而浸染,一个一个地被卷入了纷争的思想旋涡之中。

后来以慷慨一击名动天下的吴稚晖曾作《暗杀时代》,自叙心路陂陀说:

阅(《清议报》)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

《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6]

《清议报》的支配力来自于思想，《警钟报》、《自由血》的支配力也来自思想。前者用“主义”塑造了他；后者用“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重塑了他。塑造和重塑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与吴樾的不肯游移相比，身在浙江高等学堂的蒋梦麟则有了一番兼容：“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西潮》，第68页，金枫出版社1990年版。）梁启超和孙中山各以旨义立说，也各以旨义相歧。但对学堂中人来说，两者都为当日的中国划出了一种既定的思想范围。蒋梦麟乐于受用“精神食粮”而又脱不出“革命情绪”的呼唤感召，正写照了自己受浸灌和受浸染的模样。因此，“精神食粮”与“革命情绪”兼容于一人之身，同样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

学堂中的知识人接受思想，报馆中的知识人制造思想。与十年兴学相对应，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于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携此牵彼而来，成为推陈出新的一种壮观。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统计，1900年至1918年之间，先后面世的“各种期刊约有七八百种之多”¹。由此产出的多量文字，能够动人之心大半不是叙事，而是“向导国民”的说理。因此，身在局中的人物直指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矣”^{[6]（第一卷下 P803）}。言论时代以说理经世济时，播扬思想的文章一派五色斑斓，而题目都在世运与国运。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进化、权利、竞争、欧化、国粹、尚武、保种、保教、立宪、革命，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军国民主义、虚无主义相会于同一个题目之中，而后有言论的呼应与言论的亢争，犹如万窍怒号。言论的呼应与亢争用输入的观念为向慕新学理的知识人开智，也用输入的观念汇聚了知识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嬗蜕正是从这种思想的搓揉和淬砺中开始的。然而用输入的观念说中国人的国运和世运，常常容易引出人心中的焦炙与涉想，使“向导国民”的言论在呼应与亢争中弦促声急笔走偏锋。

当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之日，曾以“极端之议论”为倡率，“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

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

偏激和极端本是一种由盲目而致片面的思想过程，但在梁启超笔下，偏激和极端都是自觉的，清醒的，理性化的，千言万语由此而出：

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

这种自觉的偏激和极端已“近于刍狗万物之言”，而“我佛说法，有实有权，众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赖权法，则实法恐未能收其效也”^{[3]（P220-221）}。他在“权法”和“实法”之间寄托了一片苦心，然而苦心所托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偏激与极端一旦躐入言论以“向导国民”，则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既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言论的急走远播，也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偏激与极端的四散弥漫，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这个过程不仅养育了知音，而且养育了论敌，“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²。思想虽由笔端表述，而一旦流布，便已不能收发由心。在那个时候，偏锋易成世间的强音。因此梁启超笔走偏锋，章太炎也笔走偏锋。章士钊多年以后说革命掌故，留下过一番深思之论：

凡人持论，都未免受时代性之拘束。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之未知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者不顾也。卒之此类论点，往往助长少年人之朝气，于革命里程有益。如太炎《狱中答新闻报》，公然以五十年后之铜像为樗蒲大注，其著例也。

他由此而发议说：“刘秀凭仗谶纬，恢复大汉，近今公羊家颂言三统，悬想太平，凡此都是革命粮，可得长养革命体质。”^[7]这些体验显然都不能用学理来衡量。与偏激和极端相比，章太炎的毛病在独断。比“樗蒲大注”更典型的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04页，中华书局1977年。）。用来说服人心的，纯是一派磅礴刚猛之气。而章士钊以过来人的眼光估量当时，这种把“未知数翻作前提”的毛病在革命“论家”里其实不算少。

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以文字动天下的人物。他们的笔走偏锋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因此，在同时的报章言论里，“杀人”、“毁家”、“排孔”、“无圣”、“亡国”、“复仇”、“破坏之教育”、“激烈的好处”以及“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强陵弱众暴寡亦有合于公理”等等，都曾是醒目之作。十年之间，一批一批的知识人通过阅读别人的文章而接受思想；当他们各立宗旨之后，又一批一批地转化为写文章的里手，再用自己的文章和思想去影响别人。于是，随着思想的一传再传，偏激和独断也会在一传再传中化为各有特色的激昂与凌厉。1912年春，戴天仇作短评于《民权报》，满纸都是杀气：“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戴季陶集》，第38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当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天下目为革命言论之巨擘的时候，他还在成都的新学堂里读书，是个十四岁的孩子。而相隔九年，革命“论家”中的学生辈人已经提刀而立，向老师辈的人作怒目而视了。其间的相逐和相迫当然起于政见之争。但在他挟杀气作政争的一腔血脉贲张之中，可以看得见的却正是老师辈人传下来的独断和偏激。历史代谢自有因果，而历史的因果常常会走出情理之外。为笔走偏锋开先路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后来旨理渐变，先后敛手，不复再以文字作风雷。然而多数人不愿意回归。“见夫今之号称志士者，陈义惟恐其不高，立言惟恐其不激”^{[6]（上P500）}，在传统士人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里，笔走偏锋遂常常成为一种内在理路，起伏于主流思想之中。输入的观念经偏激与独断的截长补短而被再造和重组，又因再造和重组而变得简约明了，慑动人心。所以，笔走偏锋往往更容易感染众生。严复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器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6]（上P113）}“骄器”与偏激对应；“不根”与独断对应，都是不能入眼之物。但20世纪知识人的历史正开始于这样一个思想（政论）淹没知识（科学）的时代，作为初生的群体，他们的蜕变与思想之独亢一时相联为因果。思想的一时独亢使晚清最后十年的知识人一时独亢，而其间的理路则在一遍一遍的复制中积为知识群体的一种思想惯性。后来的岁月里，学理和学说因嬗递而不断翻新，但思想惯性却能够穿行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与不同的学理和学说相榫接。于是，在20世纪的思想史里，常常可以看到知识人用偏激和独断烧出来的火与光。他们大半各据学理，而烧出来的火与光则非常相象。

二

晚清最后十年在朝野之间独亢一时的知识人来路大半在游学与学堂。与惯见的传统士人比，学堂与学生都是世人眼里的异相。因此，在知识人以文字作议论规划天下的时候，他们自身也常被别人拽入笔下，成为议论的对象。

1907年初，御史徐定超作奏议，由“天下竞言学，而瘠邑穷乡之间，反以学堂既设，而学者更鲜”起讲，为朝廷说人世间的不平与悬殊：

古者入学不择贫富，所以凿壁偷光，犹成魁硕，茹蔬食淡，亦有名儒。今则修繕之资，逾于往昔，中人之产，耗以一年，富者得以登堂，贫者望而却步，虽欲向学，其道无由。

八个月后，给事中李灼华在奏章中论学堂，言之耿耿的也是这个意思：学堂“每入一人，岁

需百餘金，中国寒士居多，有力入学者，率皆大族富商，而寒子弟，转叹向隅”。同时的另一道奏疏则用数字为准尺比较今昔：“往昔未变法时，州县岁试率数千人，今一州县或立一校，学生三四十人。乡曲数十里间，往往无学。”^{[4] (P978-995-997)}显然，从“数千人”到“三四十人”，消失的那个数目都是被“修缮之资”淘汰掉的。与已经废止的科举相比，学堂是一种以贫富为偏斜的东西。因此，庙堂议论为穷人鸣不平，报馆议论也为穷人鸣不平。同一年的《天义报》曾以“新政为病民之根”立论，切言学堂“远不若科举之公”：

昔日之贫民有习农工而兼习举业者，故起于寒微者甚众。又义学之制随在而有，赤贫之家其子弟均可入学，且可免费，所成就者甚多。今则非得学校卒业文凭不克进身，而赤贫之民，永无得学校文凭之望矣。

沿着这种偏斜之势走下去，则“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6] (P969)}。这些话与言官的奏议一样，着眼的都是学堂带来的不平等。不平等用筛滤的办法为人分类，留下的则是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比之传统士人，那一代出自游学和学堂的知识人与社会下层一定会更加远。后来杨笃生和陈天华先后以古所未有的“中等社会”比称知识人，^{[6] (上 P969)}他们意在唤起责任，而折射出来的却正是一种自觉的分类和距离。

与社会下层离得更远的知识人也在与农村社会离得更远。十年兴学，学堂是由诏书推广的，由诏书推广的学堂同时又按诏书分布：“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8]而后，县城、府城、省城便成为新学堂的汇集之地。这个过程使教育的立足之地移到了城市之中，并顺着由低到高的等序向大城市归趋。由于诏旨兴学，当日中国的学堂不仅与知识相连系，而且与利禄相联系。1903年的《游学译编》刊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说过一番道理：

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金以买举人者，不得则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6] (上 P386)}

这些道理由游学演绎出来，而移用以说学堂之“富贵名誉”，正同样丝丝入扣。因此，相比于上个世纪严复在心路茫茫中“应募为海军生”，20世纪初年入学堂的人都是挟所愿而来的。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沿着等序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府城，从府城到省城，而后入南北都会。其中一部分脚力更健的，则能够游学彼邦，愈走愈远。在当时的名人中，章士钊是由“长沙东乡和佳冲”走出来的；宋教仁是由桃源“上香冲”走出来的；蒋智由是由诸暨走出来的；陈独秀是由怀宁走出来的。他们都在学堂和游学的路上走得很远，并就此不再回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86页。）从那一代知识人开始，这种一去不返渐成负笈远游者的常态。

清末的学堂把有志进取的读书人一群一群地召到城市里来。这些人因学堂而与“中外历史”、“中外地理”、“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天文地质”、“地文地质”、“博物学”、“兵事学”、“理化”、“法政”、“财政”、“东文”、“英文”、“俄文”、“法文”等等结缘。^{[8] (P646-670-747)}由此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细亚都是来源于西学的新知。但时当20世纪初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城市的，它们与农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因此，读书的过程便会成为疏离农村的过程。同这些东西相比，晚清最后十年滚动于文字之中的思想潮流与农村社会更加疏离。然而弄潮于汹涌之间的，则大半都是学堂中人。其间的潮头健儿常常是热心人与优秀者。历史学家顾颉刚后来以疑古成名，但当他在苏州读书的时候却还不知道世间事之可疑和应疑，并因之而非常容易被思想潮流卷入江亢虎的社会党，做了一个认真的信徒。他多年之后说当日曲折，以第三人称的笔法追叙过一段祖孙对话，非常传神地描绘了潮流中的知识人：

因为热心于新社会的开创,(顾颉刚)常常工作到半夜。祖母问他:“你忙的什么?”他说:“要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祖母说:“既然没有家庭,把我放在那里?”他说:“请你住在养老院。”这一句话触犯了祖母,禁不住大怒道:“我这般喜欢你,你竟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过活,成什么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99页。)

顾颉刚不是从内地和农村走向城市的。但他身在学堂而为潮流所牵引的思想经历则写照了一种知识人共有的社会相,20世纪初年的学堂中人大半都可以从那里照出自己的青春面容。顾颉刚学来的那一套道理他祖母全不能懂,然而他的祖母却代表了中国人的多数。这种祖孙之间的不可沟通,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那个时候的思想潮流总是走在多数人的前面。十年之间,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天演大同、拒俄运动、抵制美货等等,都是先起于报馆和学堂最多的城市,而后由一个城市传向另一个城市。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思想潮流使知识人急速地趋近于演变中的世界和正在重造的中国,两者都以城市为自己的天地。然而近代化过程已经使城市与农村分离,前者用来达意的语言常常是后者眼里非常陌生的东西的。因此,为思想潮流所吸引的知识人便不能不与农村社会越来越疏,越来越远。旧日的士人从农村起程远走,他们大半都会回来。但为学堂召去的读书人一经从农村走入城市,却大半在身心俱变中成了城市的归属者。

知识人疏离了农村社会和下层社会,与之对应,农村社会和下层社会则视知识人为异己。在已经过去的千年历史里,传统士人的源头和归宿都在农村。他们天然代表了那里的利益。旧时以四民(士农工商)分人口,就群类而言,士与农最相熟而且相亲。十年兴学促成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但与旧日的士人相比,万千农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学堂和学生。王国维冷眼看世,曾叹“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甚”(《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9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与兴学同时发生的常常是乡民打学堂。1910年,江苏宜兴因调查户口而引发谣言,“愚民无知,转辗传述,以调查者均系学界中人,遂触发其仇视学堂之积忿。鸣锣聚众,将各学堂焚毁,兹捣毁办理学务诸人之房屋”。毁学能得一呼百应,正说明了仇学不止一家一户。“其后地方绅士立将学堂匾额除下,改悬书院匾额”,绅士用这种办法来息众怒,而反照出来的则是“愚民”对书院和学堂的喜和恶。^[8] (P305) 在这个故事里,学堂和学生都是被牵连的。与之相比,同一年起于直隶易州的打学堂则使更多学生与乡民的直接冲突。地方官的奏报叙述其来龙去脉说:

值天气亢旱,有高陌社等处十八村民众,于六月二十日祈雨进城,由学堂门前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众),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6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以祈雨为迷信其实并无大错,但当大众仍在祈雨时代里的时候,道理的是非与人数的多少便成了反比。随后的砸打都是由这一类对比而引出来的。留心世务的《东方杂志》曾说:“甲辰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愚民。”(《毁学果竟成风气耶》,《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一期,时评,第78页。) 学生毁学,指的是学潮,“愚民”毁学,则专打学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独有的景象。而士与农之间曾经有过的相熟和相亲则在“闹学毁学”的过程里被打得粉碎。虽说知识人曾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中国一时独亢,但自农村社会里的人看去,他们始终来自彼岸而不在常人和常理的界度之内。所以,在鲁迅笔下的未庄,辛亥革命后的知识人便成了阿Q眼中的假洋鬼子。

十年兴学造就了一个与农村社会日去日远的知识人群体。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又很难融入城市社会。1917年,李大钊作《学生问题》,把学生视为“社会日日培养”而“自造之阶级”,而后既忿且哀地说:

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

“他处之学生吾不敢知，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当诏旨兴学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从学堂里育出来的知识人会过剩。旧日的士人在落第以后可以回家，但这一代本应属于城市的知识人已经无法回归农村了。由此而来的是一种长久的困窘：

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讨无聊之生活。（《李大钊文集》上，第426—42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话写出了深深的苍凉和落寞。当那一代知识人抵掌而谈国运和世运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后来的无所依傍。社会造就了知识人，但社会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造出来的知识人，这是近代化变迁中的脱节。于是，苍凉和落寞都预示了士的时代过去之后，无所依傍的知识人在20世纪中国的边缘化。

三

“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黄兴集》第6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在晚清最后十年里，知识人以文字作大波唤来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但后人读史，过目而不能轻忘的，常常是一现再现于那个时候的知识人的轻死剽急。

19世纪末期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然而在失败之后从容断头的谭嗣同却为后世催生一种轻死的精神。时人说：方祸难初作之日，“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某国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烈士传》，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第9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他自愿地选择了死，以四溅的颈血向天下昭示了读书人的强毅和壮烈。戊戌年过去之后，时序代谢。当继起的革命正在热力四射之际，维新人物留给20世纪的影响便只有梁启超的滔滔议论和谭嗣同的人格感召。后起的革命群曾与梁启超以文字争锋，但谭嗣同的感召则能够穿越维新和革命，长久地引发忧国之士的心底共鸣。

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这种感召和共鸣都是从勘破生死之界开始的。吴樾说：

谭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又曰：“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腐败。”至哉言乎！

他由“任侠”引申，深信，“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6] (P718-719)}，其轻死之意是非常明显的。于是而有前门车站刺杀五大臣的一场爆炸，而行刺的吴樾则在“肠腹崩裂，手足皆断”中一时绝命。从谭嗣同的轻死到吴樾的轻死，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汹涌盛涨的心底波澜。这种波澜出自信念，为急迫所推动，而在一挫再挫之后激越奔腾。因此，与吴樾相类的，还有徐锡麟杀恩铭，彭家珍杀良弼，史坚如谋刺德寿，刘思复谋刺李准，熊成基谋刺戴涛，等等。这些事都曾经震动一时，使人目睹书生操刀的轻死剽急。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杰意态越趋越近。知识人的近代化因之而与知识人的志士化常常叠合。由是，在晚清最后十年里，一面是学理与学说的激荡播扬，一面是知识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焚烧出一团一团的烈焰，倏然腾起，又倏然熄灭。在意志燃起的烈火面前，对手和自己都是很容易被焚毁的。《革命逸史》里有一则记载说：

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南?)各省，元气大损，怨声载道。有鄂人王汉谋阻击之于顺德府，卒以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愤而书遗书

一通，并将所携手枪存于逆旅，自投井而死。

他燃起的烈火没有烧掉对手，所以他在烈火中焚毁了自己。王汉出耕读之家，父兄“俱名诸生，少受庭训，年十八通五经大义”，本属名教门户里的规矩人。但在20世纪初年一经溶入知识人的蜕变之中而为风会所煽，却成了一个枪手并因此而一去不归。其间的变化，有如脱胎换骨。（《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97、19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作为志士群里自生自灭的一员，王汉在当时和后来都不算名人。正因为如此，他所走过的路迹能够真实地以殊相映照共相，为彼时的志士风貌作写真。意志燃起的烈火造就了崇高和悲壮，也造就了极端和孤行。陈天华作《警世钟》，而投海于日本；杨笃生作《新湖南》，而投海于英国。他们的文字唤起过许多国人，但自己的一腔忿郁却全部掷进了万里波涛。知识人中的优秀者一个接着一个为扑满死，为醒世死，为信念死，为愤怒死，他们的血灌溉了理想主义，也灌溉了轻死剽急。遂使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因轻死剽急而高涨，轻死剽急因理想主义而激扬。汪季新(兆铭)当日曾作《革命之决心》一文，说“贞”说“烈”：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灰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

“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以各尽所能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他在办《民报》的过程中曾经做过多年的“釜”，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则渡海北上，去谋刺摄政王了。显然，他在说“贞”说“烈”之际已经选择了做“薪”。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的交相感应，使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都会感染更多的人。于是，“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秋瑾集》，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便不仅成为意气的发舒，而且成为常理和常谭。久在感应和感染之中，出身翰林的蔡元培，文章冠多士的章士钊以及日后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前驱的陈独秀，都曾在密室里用功夫，做过“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热心人。

身当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之中，新知与旧学常常相染。20世纪最初十年里的范型知识人因之而具有一种自成一格的面目。他们在革命的催化下一面志士化一面近代化，手眼所到，常常会着力撕破传统。然而在血脉之中，他们那一代人与二千多年历史积成的士人精神仍然相通。作《革命军》的邹容从日本来到上海，出入于新人物群聚的爱国学社，而“性倜傥，喜骂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去。”^[9]邹容率性而言，以“中外之学”作尺度，对“声色狗马间”的人物无分新旧皆任情咳唾，流露的正是一种蔑视商业社会的士人本色。后来章太炎致书孙中山，追叙“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被习文教者寡，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两会之公咎也”^{[9](P383)}。他以“文教”为尺度，在革命群里显分人等，笔意中横泻的，则是士大夫独有的精神上的贵族气。自戕于辛亥年间的杨笃生既能写文章，又善做炸弹，是革命人物中的翘楚。而“夙沉浸于词章旧学”，游学多年之后，“书生本色犹在”。因此，他在《新湖南》中说历史，直言“洪杨窃天主教之绪馀”，其同情并不在为反满开先河的太平天国一边，而在“讨粤匪”的曾国藩一边。³由此显出来的褒贬和评判，仍然出自传统那一脉。在这些人身，知识和观念的近代化并没有消解他们心中的历史情结和文化心结。

清末的革命曾经卷入了工商社会和秘密社会。但能以轻死剽急为天下张大利的，则大半正是背负着历史情结和文化心结的知识人。章太炎作《诂书》，列“儒侠”之目曰：

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候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一朝，

其利及朝野。

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秦龙逢，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10]

“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非常明白地说出了士气与侠气的相印与相通。他后来入西牢，以“临命须拚手，乾坤只两头”为吟咏之词，气象正在儒与侠之间。自司马迁作《游侠列传》之后，他所指颂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信言，义者有取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便积留于中国的文化史之中，常常被士人引来寄托向往和感慨；燕赵之地的屠狗者因之而成为他们笔下怀念的对象。士言义，侠行义。因此，在以义利之辨区分等类的时代里，士人以贱商为常态，然而贱商的士心中都尊侠。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叙述和复述的过程，由此留下的应是一种精神上的心传。当20世纪来临之后，知识人正在蜕变中分化。其间背负历史情结与文化心结最多的人便常常成为最喜欢作说大义的人。他们已经开始向新知识分子转化，但在精神上他们又是最后一代士人。因此，在鼓荡革命的百折艰难里由言义而行义，他们比别人更热诚地召唤侠魂，也比别人更容易为任侠精神所导引而走向轻死剽急。1908年，汤增璧作《崇侠篇》说：“往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慑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义举。”（《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86页）他对吴樾和徐锡麟的歌颂与礼赞，着力处全在侠风和侠气。显然，其笔下既有革命人物的心声，又有历史和文化的回响。心声与回声震荡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以知识人的豪杰意态和知识人的轻死剽急为后来诞生的民国助产。由此留下的种种悲歌慷慨在文字记述中常读常新，但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里，轻死剽急终究不是一种能够升华的东西。随后而来的年代容纳不了它们。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年代里，他们便成了历史视野中消失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倡学生军说[N].苏报,(1903)06-24.
- [2]《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3]奏定日本校事项章程析[A].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1.
- [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第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辛亥革命回忆录(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8.
- [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3,715.
- [7]《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20.
- [9]章太炎.邹容传[A].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3.
-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

The New Intellectual in Ten Year's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Yang Guoqia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 Shanghai, Shanghai 200020)

Abstract The essay narrates the course in which Chines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changed into new intellectual in ten years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New politics expedited the new intellectual delivery and large of newspapers nurtured it. New intellectual was not from imperial examinations but from new school. Most of students who entered new school were not from the lower strata of society but middle of society. In another word, new intellectual carded the rural and lower societ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and the ideology of sage was large in the changed course. New intellectual had the ideology of heroes.

Key words New intellectual Political thought New school Heroes

收稿日期: 2001-12-20;

作者简介: 杨国强, 男,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¹ 梁启超:《鄙人对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大众报》1912 年 10 月 24 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说明》。

² 《四十自述》第四章。《悼梁卓如先生》,《追忆梁启超》,第 211、115 页,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版。

³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256 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 619 页。